

比较文学学派流变与双重范式转型

李 涯

摘 要：本文通过对比较文学三个学派的核心理论进行梳理，归纳出比较文学所涉及的“国际文化权力”和“文学观念”两个基本范畴，并将这两个范畴确定为比较文学理论的基础性范式，进而通过对这两个范式的三次转型的研究，说明比较文学三个学派流变的原因。

关键词：比较文学 学派 范式 转型

DOI:10.13760/b.cnki.csalt.2019.0003

众所周知，比较文学是一个年轻而不断发展的学科。这个学科经历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的阶段，目前形成中国学派。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流变，在21世纪，人们或可能获得足够的时间距离，来审视和总结比较文学流派演变的一些规律。在此，本文借助库恩的范式理论，尝试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阶段性进行基础范式的研究。

综合研究比较文学三阶段，可以看到，尽管不同时期的重点不同，不同学派的观点不同，但都涉及“文学”观念和“跨国”问题。这反映出比较文学学科一方面是文学领域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现代国际文化权力结构的表征。因此在研究比较文学的学派流变的根源时，可以分别从现代国际文化权力结构的历时演变、文学观念的历时演变两重范式的转型来理解。

首先，从国际文化权力结构的角度看，可以认为比较文学三个学派经历了民族主义时代与法国文化中心、冷战时代与美国文化中心、全球化时代与国际文化多元化三阶段。

其次，从文学观念历时演变的角度看，比较文学经历了文学实证主义、文学形式主义和文学文化研究三个阶段。

一、法国学派：民族主义意识与文学实证主义

法国学派的开创时期是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早期。梵·第根在 1931 年出版的《比较文学论》中，对法国学派的理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其研究体现出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法国中心主义态度，大多数例证均为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文学关系的讨论，并且突出法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影响。这一特点后来遭到美国学派的严厉批评。不过，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法国学派立场的特点乃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这也是自 17 世纪以来法国在欧洲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决定的。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诞生于 1643 年在德意志威斯特伐利亚召开的和会。和会结束了“三十年战争”，确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体系确定了国家主权、领土等一系列现代国际外交原则，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范畴。现代国家的自我意识由此发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最终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法国的地位尤其突出。

首先法国通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它在欧洲的重要地位，“太阳王”路易十四进一步将法国建设为当时欧洲的第一强国。法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成为欧洲的领头羊，直到 19 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法国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由此奠定。

拿破仑战争后，法国地位开始衰落，其在欧洲最强有力的竞争者是德意志。在俾斯麦的帮助下，德意志通过普法战争战胜法国，并实现自身统一。法德两国力量此消彼长，斗争日趋激烈，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再决胜负。战后，法国极力要求严厉制裁德国，试图通过巨额赔款和解除武装等方式彻底击败德国，该主张实质上体现了法国在欧洲面临的深重危机。然而，正是法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推动的严厉制裁措施，使得德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也爆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从拿破仑战争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民族主义在国家竞争之中日益高涨。欧洲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深刻体认着这一特征。从巴尔登斯贝格到梵·第根，民族主义情绪几乎成为他们研究的基本特征乃至立足点：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以自身为利益中心，并以此审视本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国际地位下降，那种以法国为中心的民族自尊心在战后不断削弱。戴高乐试图挽回法国的荣光，但失败了，越南、阿尔及利亚等海外殖民地相继独立，法国人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其中心地位的消失。因此，在卡雷的著作中，单一的法国视角渐渐减弱，进而能够更客观地观照

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影响关系。

而基亚对比较文学以“总体文学”和“世界文学”为目标这一进化论观念的否弃，一方面体现了此时期流行的存在主义对黑格尔目的论历史哲学的否弃，同时也暗示着法国人开始从哲学上否弃了国际关系的等级差序，否弃了历史悠久的法国中心论。

因此可以说，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发展变化体现了民族国家意识这一现代性的重要内在特征的兴衰。

从文学研究内部来看，法国学派的突出特征就是实证主义研究取向。从巴尔登斯贝格到梵·第根、卡雷、基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法国学派一以贯之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塑造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是法国学派为比较文学学科做出的重大贡献。

这一方法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来自18世纪以后法国的思想倾向。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都不是一种抽象的玄想，而是十分强调社会效应。这非常不同于德国。启蒙运动在法国催生了社会革命和社会行动，催生了19世纪的孔德实证主义；在德国催生了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一系列唯心主义哲学家。在德国唯心主义向内心转向，发展出浪漫主义精神的同时，法国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发展出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潮流。在这样思想倾向下，泰纳和斯塔尔夫人的环境决定论成为19世纪到20世纪初法国艺术研究的主流。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正是秉持着哲学的实证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观念而发展出影响研究的。如果说文学现代性内含着主体性意识哲学和科学实证主义两个相反的向度，那么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则是由科学实证主义范式塑造出来的。

二、美国学派：冷战意识与文学形式主义

我们今天对法国学派的理解，大多来自它的后继者美国学派对它的批评。韦勒克作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最重要的代表，首先对法国学派发难，并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展开批评。也正是在韦勒克和他的同事们的批评中，美国学派的研究规范得以确立，其在两个方面发生了转移：第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但同时落入了冷战意识形态的窠臼；第二，反对19世纪实证主义，确立了形式主义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式，抵制即将到来的后现代思潮。

我们首先看他的形式主义文学研究范式。1958年，在教堂山会议上，韦勒克提交了《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该文直接向法国学派展开批评，成为

美国学派的宣言。在文章中，韦勒克认为，“题材和方法的人为划分，渊源和影响的机械论观念，以及慷慨然而却是出自文化民族主义的动机，这些似乎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持久危机显露出来的症状”。

对此，他要求“这三个方面都需要做彻底的调整”。首先，“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线应该废除”；第二，“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并不是死板的事实，而是价值和质量。这就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无界线的原因”，“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的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和艺术的本质”，“文学艺术品本身将成为必要的焦点”；第三，“一旦我们不再将文学视为争夺文化声誉的论战中的一个论据，看作外贸的一件商品，或看作民族心理的意见指示器，我们就将获得人类能够获得的唯一真正的客观性”，“一旦我们把握了艺术和诗的本质，把握了它战胜人类死亡和命运的力量，把握了它创造一个新的想象世界的力量，那么民族的虚荣就会随之消失。人，一种普遍的人，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人，就会以其千差万别的形象出现”^①。

韦勒克上述第一个问题“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人为划界”和第二个问题“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机械论观念”，乃是两个密切联系的问题。法国学派所谈的总体文学主要还是来自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而歌德的“世界文学”乃是与黑格尔目的论历史哲学相契合的单一文学观。歌德认为，在遥远的将来，世界文学将历史性地合而为一。所以法国学派将文学的发展划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三个阶段。这一划分方式必然建立在历史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之基础上。

但韦勒克反对这一看法，他认为，只要放弃实证主义的研究，而找到一种文学的共同本质属性，总体文学的研究就可以实现。这一逻辑支撑他的下一个观念，即形式主义的文学观念。因为唯有文学的“文学性”，即形式和审美，方能成为文学的共同本质。总体文学可以在对文学性的探索中实现。

韦勒克是英美新批评的第三代文论家，也是耶鲁学派的中心人物。他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是新批评理论的经典总结之作。他在自述其求学历程时，清晰地描述了他的形式主义之路：1927年，他作为研究生第一次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接触了新人文主义的领袖莫尔及其合作者白璧德，白璧德告诉他，“比较文学如果不能严格地成为一种从属于人文标准的研究，必将成为一个最琐屑无聊的科目”；1930年，他回到布拉格，曾经成为布拉格语言小组（一个结构主义语言研究组织）成员，并接触了俄国形式主义；

^① 勒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王馨钵、杨德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8—272页。

1939年，他移民美国，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奥斯汀·沃伦，一个从新人文主义者发展成为新批评论者的学者。

在《文学理论》中，韦勒克划分出“文学外部研究”和“文学内部研究”两个主要范畴。不过，他认为这两个范畴的重要性完全不同。对于“文学外部研究”，他首先否定了19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几乎与泰纳的环境决定论针锋相对，认为只需要“探索出艺术作品与其背景及渊源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关系，……并不注意这些关系与文学是否确切相关。……因为起因解释法在文学研究上的价值，肯定被过高地估计了，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研究方法永远不能解决分析和评价等文学批评问题”^①。自然，他把文学研究的重点放到了“文学内部研究”上。

英美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都属于形式主义，其特征都是将文学问题放到文本内讨论。相对于实证主义、现实主义研究思路，形式主义是一种现代主义的研究范式转型，其理论渊源是康德《判断力批判》关于审美无功利论和纯粹美（形式美）的审美自律观点^②。

詹姆逊曾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以符号学的方式讨论了实证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区别。他认为：现实主义关注的重点是符号/意符（符号）与参符（现实）之间的反映关系；现代主义是符号的自律，是与现实的疏离；后现代是指符的自律，乃至与意符的疏离。

这样看来，韦勒克等的文学研究乃是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其范式与实证主义、现实主义不同。因而比较文学美国学派自然也属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它与法国学派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之间的争执，绝非简单的个别方法之争，而是代表着整个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在1965年韦勒克发表的《今日之比较文学》中，他一方面继续抨击法国学派的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对新兴思想大加挞伐。在文章中，他认为伊哈布·哈桑的带有后现代色彩的文学观已经对审美的形式主义文学观念构成了巨大威胁。他愤怒地说：“哈桑的这种极端主义是一种危及任何有意义的文学研究的相当严重的征兆。它散布了艺术与审美消亡的符咒。”^③这时，离后现代元年——1968年，已经不远了。

^①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3—74页。

^② 勒内·韦勒克：《伊曼努尔·康德的美学与批评》，见《辨异》，刘象愚、杨德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2—128页。

^③ 勒内·韦勒克：《今日之比较文学》，见《辨异》，刘象愚、杨德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7页。

在法国实证主义和后现代文化研究之间，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确立并坚守着形式主义的文学观。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民族主义观念的批评。韦勒克所说的比较文学的第三个危机就是文化民族主义。他认为，比较文学的兴起本来“是作为19世纪学术研究中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动，是对法、德、意、英等多国文学史家所持的孤立主义的反抗”，但是，“这种想充当两国之间的中间人和调停者的真诚愿望，却常常被当时狂热的民族主义所淹没和歪曲”。“他们尽可能证明自己国家对其他国家多方面的影响，或者更为巧妙地证明自己国家比任何国家都更能充分吸收和理解外国的大师。”^①

诚如韦勒克所说，19世纪的欧洲充斥着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氛围。国际关系史告诉我们，拿破仑战争之后的19世纪乃是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最终形成的时期，欧洲内部的德法之争以及外部的海外殖民地之争都推动着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

战后，西欧在美国的扶持下展开了重建与和解工作。法国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的遏制战略，转而尝试建立一种经济合作机制。这就是“钢煤联营”，它是后来的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其进一步发展为带有某种松散国家性质的欧盟。战后西欧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减弱。

美国更是如此。美国远离欧洲，避免了欧洲经历的多次战争。在海外殖民地争夺问题上，美国作为“后起之秀”无法在实质上插足，所以倡导“门户开放政策”，既获得了各种利益，又避免了与其他国家发生正面冲突的危险。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大贡献。战后，美国在援助欧洲重建、组建联合国、筹建新的金融体系等方面都起着领头作用，成了西方世界的中心，其价值观也深刻影响了西方世界。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种民族结构使得美国完全不像欧洲单一民族国家那样携带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具有较大的包容性。

韦勒克出生于奥匈帝国，并经历了奥匈帝国的瓦解。他在欧洲一定亲身体会到了那里的民族主义。而到了美国，这种情绪消失了。他之所以对法国学派的民族主义如此敏感，必定是因为他对狭隘民族主义危险的警惕，同时，也因为他对战后西方民族主义落潮的体认。所以，韦勒克领导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从法国学派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引出来，将眼界拓展到整个西方世界。不过冷战思维和现实境况也让他就此停步。

^①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王馨钵、杨德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5—267页。

在1965年的《今日之比较文学》一文中，韦勒克专门讨论了苏联的比较文学学科：“斯大林时代，比较文学在那儿还是一个禁区，解冻之后，人们重新认识到比较文学的重要性，1960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正式重建这一学科的会议。俄国人傲慢地认为，他们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解决了比较文学的所有问题。”^①随后，韦勒克反驳了苏联学者对他的指责，进而批评苏联学者把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冷战化。

韦勒克并非没有看到比较文学的世界眼光，他说：“我坚持认为，比较文学的最终理想是比较研究包括远东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学。”^②但是，冷战不仅对于东方而言是一个限制，对西方学者而言同样是一个限制。韦勒克的理想并没有在美国学派那里实现。所以在其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实践之作——多达八卷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之中，他没有迈出欧美一步。

总的来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雅尔塔体系和冷战格局下，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发生了转型，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被东西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对立取代，比较文学的政治和价值立场从民族主义转向了冷战对峙。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从法国学派的狭隘民族主义视角扩展到了整个西方，但还是不能够延伸到东方。这一藩篱要等到冷战后，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方能突破。

三、中国学派：全球意识与文化研究

韦勒克《今日之比较文学》既是美国学派的总结性文论，同时也已经预感到比较文学的新危机。当韦勒克指责文学领域的哈桑，指责艺术领域的劳申伯格的时候，他确实已经有些过时了。虽然1965年的美国比较文学哈佛大学会议距离韦勒克举起美国学派大旗向法国学派进攻（即1958年的教堂山会议）还不到十年，但是美国学派已经处于崩溃之中，它建基于其上的基本范式在逐渐瓦解。

首先，形式主义文论在1968年之后已成过时之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欧洲的解构主义风潮于70年代登陆美国，迅速取代形式主义新批评，进而结合文化研究成为美国文学研究的正宗，包括被韦勒克严厉斥责的哈桑、介绍解构主义的卡勒、文化研究理论家詹姆逊、后殖民主义宗师赛义德等都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文学理论界的大师级人物。至此，奠基美国学派的形式主义

^① 勒内·韦勒克：《今日之比较文学》，见《辨异》，刘象愚、杨德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4—46页。

^② 勒内·韦勒克：《今日之比较文学》，见《辨异》，刘象愚、杨德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4页。

彻底终结。

其次，全球化进程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借由里根、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迅速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冷战以东方阵营的瓦解而结束。塑造美国学派研究范式的西方中心主义也最终转变为全球视野。而亨廷顿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则成为比较文学要面对的新的语境。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港台学者初步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设想。80 年代，中国大陆学者季羨林、乐黛云等也提到建设中国学派的主张。90 年代中期，曹顺庆系统地提出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主张，他认为：“‘跨文化研究’（跨越中西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源泉，立身之本，优势之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派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中国学派的所有方法论都与这个基本理论特征密切相关，或者说是这个基本理论特征的具体化或延伸。”^①

此后，曹顺庆等学者继续探索，重新定义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② 这一定义除继承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精髓外，最重要的是发展出了“跨文明”和“跨学科”这两个中国学派独有的范式。

可以认为，跨文明研究范式反映了冷战终结、全球化加速的现实，同时也是对的新的国际文化和政治问题的敏感反应。而跨学科研究范式则反映了文学研究从现代形式主义向后现代文化研究转型这一文学观念的系统性变革。

首先讨论跨文明研究范式与全球化进程之间的关系。20 世纪 70 年代末，东西方都酝酿着变革。西方国家在经历了 70 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英美国改变战后长期施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转而推进国际经济自由化，全球化进程由此开始加速。1972 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中美之间开始接触。1979 年，中美建交，这标志着冷战的铁幕被撕开了一个口子。1978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希望融入世界。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并没有动摇中国融入世界的决心。90 年代，中国加速市场化并更加积极地与国际接轨。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这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一环。现在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① 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中国比较文学》，1995 年 1 期。

^② 曹顺庆：《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47 页。

体,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格局。

在此背景下,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视野必然出现。曹顺庆等学者敏锐地感知到这个趋势,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提出这一主张,为此前尚未成形的中国学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就在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提出跨文化、跨文明比较和对话的研究范示的同时,亨廷顿于1993年开始,从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的角度,提出了影响至今的“文明冲突论”。他的论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出版于1996年。在书中,他警告西方人,冷战的结束仅仅意味着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随之而来的将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虽然已经理解了全球化的进程,但其理论预设仍然是民族国家的冲突模式,只不过是将其19世纪的民族主义扩大为一种“文明主义”而已。而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学者却以对话、交流的思路来处理文明之间的差异。

中国学派从来都承认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并认为这种承认乃是其理论区别于法国学派的民族中心主义和美国学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基础。但是中国学派并不认为这种异质性必然带来冲突,而是主张在跨文明和文化的基础上展开对话、讨论,甚至生成新的文化质素,创生出新的人类文化基因。

循着这一思路,曹顺庆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他认为:“如果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提出都属于站在东方人的立场上来考虑西方人还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我们的基本立场是站在东方的角度来考虑,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考虑;那么变异学的提出就不仅仅是东方的问题,不存在东方学者站在东方的立场来反驳西方的问题,它(变异学)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或者用当代时髦的话说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①这可以说表明了中国学者对文明主义的危险有着强烈的警惕,对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有着清醒的防范。

随后,曹顺庆谈到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核心研究内容——“文学的他国化”。他说:“首先它是变异学的重要观点。它是由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个案与接受造成的变异,这种变异会最后变异成别的国家的文学,我们称之为他国化。”“接受国的文化可能消化外来文化,把它变成接受国的文化,这就是本土化。”^②不论是他国化,还是本土化,都是文化之间的和平交流与对话,这种对话中将产生文化新质。

^① 曹顺庆:《南橘北枳:曹顺庆教授讲比较文学变异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页。

^② 曹顺庆:《南橘北枳:曹顺庆教授讲比较文学变异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页。

曹顺庆发展出的变异学，可以说是在全球化视域下对比较文学的新拓展，同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为世界应对文明冲突提出的和平解决路径。

其次来看跨学科的问题。跨学科的问题在美国学派那里已经初露端倪，如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1962年）中认为比较文学还可以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如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宗教等。不过，雷马克的这一观点显然没有得到作为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席的韦勒克的支持。在引述了雷马克的上述定义之后，韦勒克非常辛辣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但雷马克先生却不得不作出某些人为的，站不住脚的区别，如研究霍桑与加尔文教的关系被称做“比较文学”，而研究霍桑关于犯罪和赎罪的观念的文学则被称作“美国文学”，这类区别显然是没有多少道理的。雷马克的这一提法似乎是为一个实用的目的设计的，那就是，在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把某一论文的题目贴上“比较文学”的标签，可以抵挡那些认为自己的学术领域受到侵犯的同事们的抱怨和攻击。但是作为一个定义，它却经不起推敲。^①

韦勒克对雷马克的拒绝并非偶然，他的形式主义和审美主义立场，他在《文学理论》中对文学外部研究的贬低，都指向对雷马克的反对。应该说，雷马克在1962年确实没有办法对他的跨学科定义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因为这一理论体系必须是对形式主义文论的突破，并发展出文化研究的向度。

通常认为，文化研究发端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在80年代成为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思潮和批评实践。它跨越学科壁垒，积极介入文化、政治和社会运动，反过来对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文化研究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研究领域和方法，它肇始于对形式主义文论的不满，要求将文本内研究与文本外研究打通，去除形式主义那种封闭的文本中心主义和审美主义，在跨越学科边界的同时，跨越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政治和经济的边界。

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传入中国。1985年，美国后现代理论家、文化研究专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应邀到北京大学做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讲座，系统介绍了文化研究及其后现代哲学基础，第一次将文化研究介绍到中国。不过，当时的中国学界未必能真正理解这一理论。不久之后，文化研究迅速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一思想氛围自然影响到

^① 勒内·韦勒克：《辨异》，刘象愚、杨德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页。

比较文学学科领域。曹顺庆在此时提出跨学科研究的观点，显然是吸收了文化研究的观念。因此可以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张建基于并体现了全球化的国际范式和文学研究的文化范式，它是世界比较文学在新时代的最新拓展。

事实上，本文对比较文学三个学派之更替的研究，也借鉴了文化研究的方法，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中国学派的主张看作文本话语，进一步讨论：到底什么样的权力网络形塑了他们的议题设置和话语方式，又是什么样的结构性的权力变化促使这三个学派此消彼长？本文从国际文化权力关系和文学研究范式两个维度辨析该问题，最终，从比较文学学派流变而透视出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世界的结构性变革。

作者简介：

李涯，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副教授。